道德教育与民众动员：山东抗日根据地良心检讨运动探究（1943—1945）

耿东旭

（河北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1）

摘　要：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中共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急需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首当其冲的便是希图民众能够踊跃参军，但民众由于心存许多顾虑，这无疑增加了中共扩军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良心检讨运动。中共通过有意的引导，使山东地区的民众拥军观念得到加强，民众劳军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军民关系更为密切，山东抗日根据地由此出现了民众踊跃参军的局面，确保了八路军在抗战反攻时拥有较为雄厚的兵员后备力量，从而为抗战的顺利开展奠定了人力基础。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良心检讨运动；民众动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148-09

收稿日期：2025-01-02

作者简介：耿东旭（1994-），男，甘肃环县人，河北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05

良心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个人自律的突出体现。良心是无影无形的，但它又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它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判断、指导和监督的作用。正因如此，曾几何时，良心并非是民众检讨己身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中共的有意引导下，由千百万民众集体参与的仪式化政治行为。1945年9月，黎玉同志在总结妇女工作时谈到："一年来妇女在各个群众运动中表现出她们的空前的积极作用，有了妇女解放的新气象"，"她们在村民大会上进行良心检讨，坦白地自我揭发了自己对不起军队的行为，如做衣服时在棉花中掺沙，不给好房子住"。① 实际上，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曾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的良心检讨运动。这场良心检讨运动源于莒南县，后扩展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其他地区，其实质是一场具有道德教育性质的群众运动。道德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它的调节范围却很宽泛，它是人与人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润滑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对于道德力量在民众动员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忽视。基于此，笔者拟对在抗战反攻阶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性的良心检讨运动的缘起、中共的引导过程，存在的不足以及取得的成效作一论述，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良心检讨运动的缘起

抗战时期，位于战斗前线的山东八路军武器主要来源对敌顽作战以及收集民间枪支，弹药主要依靠于自产。② 在敌后战场，想要进行大规模的军工生产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与日军优良的装备相比，山东八路军的武器是较为落后的。同时，山东八路军所掌握的军事技能都远逊于日本侵略者。1944年8月，罗荣桓曾谈到：山东八路军将士"军事技术一般是很差的"，"部队中大多数战斗员，包括干部在内，不懂射击，对刺杀信心不高，手榴弹消耗甚大，杀伤敌人不多"。③

由于在武器、军事技能等方面与日军存在显著差距，山东八路军只能通过英勇奋战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①《论群众路线与山东群众运动——黎玉在1945年9月分局群众工作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1页。

②刘世超：《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③罗荣桓：《罗荣桓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山东纵队在成立后五年多的时间中，与敌作战共6500余次，歼灭日伪军10万余人。同时，山东八路军还通过游击战战术牵制了很多日伪军，仅在1942年，山东八路军就牵制住了日军4.5万、伪军17万人，占同时期华北日军总兵力的18%，伪军总兵力的57%。[①] 但是，这些辉煌战果是来之不易的，是由无数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与日军武器、军事技能的差距造成山东八路军巨大的伤亡。抗战初期，山东纵队由于战力较弱，大约需要以伤亡4人的代价才能俘虏敌军1人，而一一五师的战力较强，其伤亡与俘虏敌军能够基本持平，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的战力在逐渐加强，尤其是在1943年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合并之后，山东八路军伤亡与俘虏敌军的比例大体为1:2.68。[②] 可见，在此时，山东八路军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战果。但在整个抗战时期，山东八路军总共伤亡129976人。[③] 显然，山东八路军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众所周知，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人数多寡对战局胜负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武器落后、军事技能较差、伤亡巨大的情景下，中共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 因此，中共号召实行全国抗战，全民族抗战，积极动员普通民众参军，使普通民众成为战争的候补力量。然而，直至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参加八路军仍然有很多顾虑。

第一，惧怕死亡。现代战争往往杀伤力巨大，士兵伤亡率惊人。面对如此高的伤亡率，农民的参军情十分低落。滨海区一支委说：要我当兵，“杀我的头我也不去，要我去在等一辈子吧”。[⑤] 牟平县的“小知识分子和商人出身一般的要求在后方工作，认为工作比当兵强”。[⑥] 而只要是有医院或残疾所，教养所所在的村子，民众对战士伤亡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们“每天所见到的都是些伤员病号、断臂折腿的”，所以他们更不愿意参军。[⑦] 如1944年，莒南县一个村庄因为医院驻地，群众怕死心理极严重，村干部刚动员成功6人参军，恰巧石沟崖战斗结束，抬来十几个伤兵，即把群众吓坏，把参军对象吓垮了。[⑧] 可见，民众的怕死心理，给中共动员民众参军增加了很大阻碍。

第二，对八路军的误解。为破坏八路军的扩军运动，敌伪军、部分落后的封建会门组织、士绅以及逃亡友军战士各种造谣。如1945年，滨海区的敌伪军方面造谣说：“河东又在共产了（意思指租地给抗属种），八路又在搞什么鬼，整天坐轿骑马的”；一些会门如佛教会则说：“死也不当兵”；在上层方面，日照某些士绅造谣说：“李先济快来了，谁干就给谁上名字”，“八路军缺兵拔人了”，“哼，今天坐轿，以后就抬死了”，莒南县大埠南一士绅说：“八路军扩大了，就是咱倒霉”；西崖泉有30多个友军逃兵说：“咱们死也不回去”。[⑨] 由于各种谣言的传播，部分民众对于八路军存在一些误解。如1944年，莒南县一个富农刘之学谈到：“八路刚来时，我当真要共产共妻，所以成立识字班，就不叫我妹妹去上，又怕中央军会来，村上叫咱当自卫队长，咱也不敢干，心里愁，不知八路军几时就走，给他出这个力干什么，我做买卖，本钱不小，都是自己的，可是我怕共产，都说是大家合伙的”。[⑩] 而这些误解的存在无疑又增加了八路军扩军的困难。

第三，受家庭的影响。家庭，“不仅是一个婚姻生活的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生活单位，承担

---

①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②刘世超：《中共山东抗日武装武器来源探析》，《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4期。

③《八年抗战中山东解放军的损失情况》（1946年），中共山东党史研究室：《山东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档案文献选编》（第1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④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页。

⑤《滨海区委组织部对拥参军运动中支部工作的意见》（1944年1月31日至2月20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29-01-0005-005。

⑥《牟平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2-008。

⑦《滨海区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7-01-0013-001。

⑧《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⑨《滨海区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7-01-0013-001。

⑩《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着生产与消费、赡养、祭祀、生育与教养、婚姻生活和精神娱乐等多种功能。它是农民的个人生活的堡垒和目标，是农民的精神寄托”。[①] 正因如此，很多民众是安土重迁的，他们“不情愿离开土地和家庭去作战，这种想法根深蒂固”。[②] 崔介曾回忆到：“在个体经济时代的农民，经过扫荡与反扫荡的残酷斗争，抛开自己的父母妻子家庭生活，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③] 同时，年轻男子是家庭的强壮劳动力，一旦去参军，即使政府会对抗属有一定的优待，但“其家庭的生产生活一般呈下降趋势”。[④] 因此，妇女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去参军，她们会在家参军时进行“扯腿”，这极大影响了中共的扩军运动。如1945年，掖县小台头村的一个积极分子见他老婆出来闹事后便坚决不去参军。[⑤]

第四，出于对时局的考量。“尽管绝大多数农民受视野、能力及信息占有量的限制，难以对时局做出准确判断，但不能否认农民对形势有自己的判断”。[⑥]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后，国共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但由于八路军的武器不如国民党军，部分民众并不看好跟随八路军能有光明的前途。正如渤海区委在1945年拥参军运动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民众“认为八路军好是好，但是否能长远，八路军能打仗但是武器不好，不如中央军。”[⑦] 由此，普通民众对于八路军持轻蔑和应付的态度。招远县一个商人谈到：“我过去在敌战区做买卖，听说根据地里有八路军，我根本瞧不起，前年秋天回家，见到区中队破旧的，更觉得讨厌。”[⑧] 莒南县一个地主也说到：“从前对待八路军都是应付的，因为咱想八路军是站不住脚的，早晚都要走。”[⑨] 不仅如此，部分民众为谋出路，暗中与国民党军与汉奸取得联系。莒南县一个党员在反省中谈到：“从前看到八路军穿不好吃不好，背着土压五，还不如五十七军，所以我就偷偷的沟通五十七军和汉奸。”[⑩] 可见，普通民众虽对战局难以做出准备预判，但其在对八路军、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进行直对比后，得出八路军武器远逊于国民党军的结论，因此，在部分民众的内心里，对参加八路军是十分抗拒的。

第五，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山东作为孔孟故里，它是“礼仪之邦、封建的堡垒。封建势力在山东已有数千年统治的历史，它拥有土地、财产、政权，还拥有武装、法律、牢监。它有深固的社会基础”。[⑪] 普通民众深受“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束缚。春秋时期，男子以不能当兵为耻，但自秦朝以后，各封建王朝却推行所谓的“无兵的文化”，男子因此不愿去当兵。[⑫] 及至民国，因战争频繁，“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在民众心中更得到强化，甚至当时的一些基层干部在内心也是蔑视当兵的。牟平县的部分干部认为“当兵下贱”，“当兵是牺牲品”，该县二区的调查委员王均高曾说：“妇女和战士结婚，眼珠子不亮，明天就会死。”[⑬] 而民众存在的这种“好男不当兵”的思想使中共的扩军更为困难。此外，民众的脑海中往往还存在宿命论的观点。尤其在出远门之际，民众往往会通过占卜的方式来测凶吉。在当时，部分民众在选择当兵时会请一个算命先生算命，若命相不好，即使已经决定参军的民众也会反悔。如滨海区有个新战士，家里

---

①周晓红：《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9页。

②[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340页。

③崔介：《拾遗集》，1994年，第349页。

④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⑤《掖南县7、8、9月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4-008。

⑥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⑦《山东分局批转渤海区委关于拥参军运动的通报》(1945年3月1日) 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12-006。

⑧《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⑨《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⑩《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⑪《抗战的山东 统战的山东——1941年9月朱瑞在山东统战会议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7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⑫王龙飞：《由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开放时代》，2019年第4期。

⑬《牟平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2-008。

给他算命，算命先生说："出门有灾"，而这一句话就使一个成熟的对象就垮台了。①

显然，民众存在多种顾忌，他们"通常是最为消极、最无精致目标、最少组织性的阶层"，② 而中共因将普通民众作为自身的统治根基与力量源泉，在征兵时，始终强调自愿原则，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征兵等问题上的一大不同"。③ 由于民众自身的顾忌以及中共实行的自愿原则，中共唯有经过充分的政治动员才能实现兵员的扩充。正如刘居英所言："没有充分的政治动员，农民是不会参军的。"④

山东抗日根据地作为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敌后战场的枢纽，战略地位尤为重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1939 年和 1940 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 25 次，其中万人以上的 2 次；到 1941 年和 1942 年则增加到 70 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 9 次。日军的疯狂进攻阻碍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1942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 1/3，部队减员 1/4。⑤ 为更好地进行战略反攻，1944 至 1945 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参军运动。而在参军动员过程中，中共积极开展群众性的良心检讨运动，以道德教育的方式动员民众自愿参军。

二、中共对良心检讨运动的引导

中共在发动民众进行良心检讨时，必须进行适当的引导。提问本是社会交往中很常见的一种活动，它是打开话题的常用方式，但往往被人忽视的是，提问者往往可以根据问题的设定使回答者按照自己的规划进程发展，从而获得交谈中的主导地位。在进行良心检讨时，中共先向党员提出"八路军是谁的队伍"，"为什么要提出拥军劳军扩军"等问题来询问党员，启发党员检讨自己过去对党军的不正确认识，然后给他做总结，进行阶级性的拥军教育及前途教育，为其说明"八路军不仅是老百姓的队伍，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队伍，咱们自己的党军，不仅要打鬼子，而且要建设新中国，没有八路军，就不能建设新中国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不能过更好的生活，现在抗战要胜利了，为了准备反攻，必须加紧拥军扩军"。可见，中共通过提问——回答的方式，不仅引出了与民众交谈的话题，还在不自觉中使谈话能够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同时，因为口号是"指引群众行动的武器"，"口号愈明确愈通俗，就愈适合群众的口味，群众接受就愈快"，"用群众自己的词汇，解决群众自己的思想问题，作用非常之大"，⑥ 所以中共在进行民众良心检讨动员时便提出了诸多口号，包括"军队好咱这样好，咱对军队咋样？""大家不要忘本""大家要讲良心话""口头拥军，对不起良心"等。可以看出，这些口号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非常适应"群众的口味"，并且这些口号以"良心"为切入点，能够时刻警示民众，使民众可以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和批判。

随后，中共积极采取开会的工作方式引领群众进行良心检讨。开会比一般的谈话协商更为郑重，方便使与会人员了解问题的重要性，促使与会人员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后可以坚决贯彻执行，同时，开会"可以使人们从人数上产生一种安全感"。⑦ 由此，开会是中共常用的一种民众动员方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到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⑧ 在当时的良心检讨运动中，村支委会议、村干部会议、工人会议、农救会议、青年会议、妇救会会议、村民大会、小组会议等形形色色的会议随处可见。为减轻群众的压力，塑造良好的检讨氛围，中共在会

---

①《滨海区参军工作总结》(1945 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7-01-0013-001。

②[美]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21 页。

③王龙飞：《由民到兵：抗战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兵员问题》，《开放时代》2019 年第 4 期。

④刘居英：《山东人民的参军运动》，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 15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5 页。

⑤萧华：《艰苦岁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第 187 页。

⑥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⑦柯鲁克：《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高强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第 33 页。

⑧毛泽东：《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年，第 113 页。

前就向民众说明“坦白是光荣的，不是耻辱的，并申明宽大政策”。[①] 在开会过程中，中共一方面要求党员和干部要避免相互攻讦，因为党员和干部“互相争论、反驳、转移精力会引起争论”，另一方面又要求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要“热烈发言，把会场引发活泼紧张的状态中”，而在会议进入高潮时，一些村干部则提出响亮的口号，充分调动民众的情绪。如招远县东沟村长刘春宝进行了良心检讨后提出：“我一定要动员我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我大儿不去，我要动员我二儿，保证去一个”，当时在场领导就向全场高喊：“我们要向刘春宝同志学习！动员自己的儿子参加八路军!”[②] 显然。中共在引导民众开良心检讨会时，非常重视塑造会场的情绪与氛围，这对推动落后分子发言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利用回忆的方式，将抗日民主政府的治理与敌伪顽统治的情形形成对比，把民众翻身以后和翻身以前的情形形成对比，使民众清醒的认识到是民众的翻身是由八路军拼命打仗打出来的，没有八路军就没有根据地，民众就翻不了身，就没有好日子过。同时，中共向民众说明八路军的爱民行动和战绩，使大家认识到八路军是自己人，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和群众一条心，八路军帮助群众挑水送粪、浇田、收庄稼，八路军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就省吃俭用，努力生产，八路军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就不顾流血牺牲，拼命的打鬼子打汉奸。此外，树立以我为主的反攻思想，说明要抗战胜利，没有八路军不行，八路军的力量一天比一天大，到处打胜仗收复失地，解放人民，而国民党的军队，天天打败仗，去地方压榨老百姓。通过上述做法，民众以良心作为评判的依据，根据亲身经历“对八路军的认识、对八路军来往时的招待、借东西、倒房子、纳给养、缝补衣服，对民主政府的交公粮、田赋、军队作战时的配合、站岗放哨、作战送汤、运输子弹、抬担架、送伤员、动员归队、扩军参军等”作详细的检讨。[③]

为了使良心检讨运动能够顺利开展，中共积极培养良心检讨典型和积极分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民众“坦白反省自己的错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如果事前不经过干部的反省讨论和组织群众进行小组里的反省讨论，就不会发挥干部和进步群众的模范带头作用，落后群众便带不起来。同时，若不先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就马上在大会上反省，必然形成没有准备，群众的反省就会不深刻。另外在检讨会上，如果干部不先反省或反省不深刻，群众就不会反省，也不愿反省，更不会反省的深刻”。[④] 另一方面，民众普遍存在着从众心理，其在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后，会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这种从众心理往往会导致民众“有他的模仿性，看见人家怎着他即怎着，别人敢说他即敢说，别人敢作他即敢作，一人不说都不说，越说的多了，越说的多”。[⑤] 由此，中共必须通过典型人物的示范检讨来推动民众的良心检讨。而典型的选择一般是共产党员，中共在发动民众进行良心检讨之前，先布置党员，使其在检讨大会上起带头作用，若是该地党员较少时，则培养和布置好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如广饶县政府在总结时谈到：在召开村民检讨大会时，“应要及早注意，布置党员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⑥]

在布置好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之后，中共确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众检讨步骤。以广饶县为例。首先，中共执行“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先组织党员进行检讨：在各村支委会上进行检讨后，再到党的小组内启发教育党员检讨。在此环节中，中共趁机物色培养出能在群众开会时起示范作用的党员或者积极分子。其次，中共组织基层干部进行检讨。村干部“既是中共基层政权的代表，也是生活在血缘、地缘环境中的普通农民”，他们是党与群众联系的关键枢纽，在动员民众参军的过程中，村干部“种种角色和心态因场域不同而异”，[⑦] 而为使良心检讨运动能够更好的在基层实行，中共在各区召开全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会

---

①《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 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②《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 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③《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 年 5 月)，山东省档案馆：《渤海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 3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3 页。

④《招远县 1945 年 1、2、3 月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 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⑤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⑥《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 年 5 月)，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24 页。

⑦齐小林：《职责与顾虑：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村干部心态》，《河北学刊》2015 年第 4 期。

议，利用布置好的党员及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推动影响大家检讨，这样使村干部的思想得以打通，随后，村干部与积极分子在回到村后，分头召开各系统的干部会议，加强教育，打通其思想。最后，中共组织普通民众进行检讨。村干部及积极分子分别深入工、农、青、妇、武、村政各系统，对各系统的会员进行检讨，在各系统检讨完后，再召开村民大会，组织全村民众进行检讨。[①] 可以看出，中共在发动民众进行良心检讨时，形成了“党员——基层干部——普通群众”的检讨次序，经过事前的酝酿教育，干部与积极分子的模范作用，推动民众检讨，可以有步骤地进行，使党员影响干部，而后又以党员和干部一起影响普通民众。这就使民众的良心检讨运动可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而顺利地开展下去。

当然，民众对于进行良心检讨还是心存顾虑的。如广饶县一个村庄的民众发言不积极，干部在检查后发现，该地民众有两个顾虑：一是有坏分子在内，怕检讨了之后被地主恶霸知道，对自己不利；二是怕谈了过去的不对，叫别人看不起。[②]中共作为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想办法消除民众的顾忌。因此，中共要求村干部与培养好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在召开良心检讨会之前，要特别注意研究群众是否有检讨的顾虑，若有，则需向民众进行反复的动员解释。在开会过程中，中共要求采用座谈的方式，会议不作记录，更为重要的是，村干部在进行示范检讨时要“反对虚荣要面子，大胆进行反省检讨自己；反对任何讽刺小广播；要看重检讨自己、少牵扯别人；反对自作聪明，把反省深刻者，看成傻瓜，自己有尾巴不肯割掉，夹着尾巴装好人；抓住中心不要东扯西扯，应付差事；不要有任何顾虑”[③]，由此，开会场面不至于太过严肃，这对消除民众顾虑和顺利开展良心检讨运动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中共有意识地引导之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在1944至1945年的大参军运动中，各地政府纷纷组织民众进行良心检讨运动。1945年，据对滨海区的调查，津浦路南各县平均85%的村庄，都进行了良心检讨。[④] 足见这场民众良心检讨运动的浩大规模。同时，中共强调民众的良心检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反复检讨后才能取得效果。如广饶县在1945年，几乎所有村庄的民众都进行了良心检讨，其中，大部分民众检讨了四五次，有3个村庄的民众甚至检讨了10次。这也衬托出中共强有力的组织能力。[⑤]

三、山东抗日根据地良心检讨运动的不足与成效

中共在开展良心检讨运动的过程中，尽管始终坚持对民众的引导，但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将良心检讨运动简单化处理。部分村干部“犯了急性病”，回到村里之后，不经动员和教育民众，就立刻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良心检讨。由于对大会的掌握与指导事先布置不够周密，只提出了一些原则理论问题，忽视了实际问题，村干部一遇到问题便目瞪口呆，领导上全处于被动，缺乏预见性，临时抱佛脚，导致理论与实际脱节。[⑥] 同时，村干部为了能够快速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过分追求检讨人数的多寡，而不注重民众的检讨是否深刻。而开大会的方式无疑可使民众检讨人数迅速暴增，因此，在良心检讨时，许多村干部重视大会的作用而对小组讨论的方式有所忽视。然而，每次大会的时间有限，很多会议是“几十个人参加，但仅有几个人发言”，而发言者大都是积极分子，这就不可能使民众普遍进行检讨。另外，民众心中的一些顾虑，“也很难一下子就被打消”，在检讨时自然“就会吞吞吐吐的不深刻”。[⑦]

第二，部分村干部没有发挥典型的作用，中共虽然用培养积极分子、树立检讨典型的方式打开了民众良

---

①②《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渤海抗日根据地档案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2-24页，第23页。

③《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④《滨海区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7-01-0013-001。

⑤《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年5月)，第23页。

⑥《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⑦《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年5月)，第25页。

心检讨的局面，但实际上，中共培养积极分子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召开大会之前，村干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相结合，以积极分子的言行带动落后分子的思想转变。而在检讨大会陷入沉寂之时，党员和积极分子应该重新发言，带动全场民众进行检讨。另外，对于民众检讨时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积极分子可以与其开展思想斗争，这对群众的教育意义很大。然而，事与愿违，许多村干部并未清醒地认识积极分子的这些作用，在开会前，未划分小组，结果将许多不同对象进行了一样的教育，因而许多民众在良心检查中，抱着敷衍的态度。在开会时，党员和积极分子“发言结束后，就失去了作用，未能进行正确的帮助中坚分子、推动落后分子，因此就出现积极分子和村干部脱离群众的局面”。①

第三，部分民众在检讨时，害怕检讨出来的错误会受到惩罚，因此，抱着敷衍应付的态度来进行检讨。招远县后路家村一个老百姓就说：“不检讨不行，没法子，我只管到时候乱扯上点把”。② 而这种不良心态的存在造成部分群众在检讨时出现“形式主义”的毛病，部分民众抱着“法不责众”的态度，人云亦云，男人主要检讨自己对抗属代耕持应付的态度，不上心，女人则检讨自己给八路军推磨掺沙的事迹，一些本没有向军粮里面掺沙和水的民众也称自己有掺沙和水的经历。③ 更令人诧异的是，一些民众在检讨时忽略了重点，出现胡乱检讨的景象。如胶东各救会在1946年初的工作总结中写到，1945年的良心检讨使民众“认识到八路军的好处，检讨了对不起军队的事情”，但其也存在不少缺点，部分民众在检讨会上大肆检讨男女关系，这就“使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分散到不必要的事情上去，这不能不说是损失”。④ 正是由于部分民众的敷衍，良心检讨运动在根据地内的一些村庄开展的并不顺利。平度县政府在1945年的报告中称：有一个区“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干部到群众，从有组织的群众到无组织的群众，深入彻底检讨过的村子可以说是一个也没有”。⑤ 可以看出，良心检讨运动在部分地区的落实并不到位。

尽管存在上述的不足，但总体来看，在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由中共引导的民众良心检讨运动在山东各地普遍开展，其取得的效果极为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提高了民众的拥军观念。马克思曾指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⑥ 在当时山东地区的普通民众，“一般是比较落后守旧”，又加上国民党“曾长期统治着这里的群众”，所以群众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⑦ 在进行良心检讨时，中共动之以情，引导民众将从前的生活状况与八路军来时的状况进行对比，帮助民众认清八路军对自己的帮助。正如昌南县的民众检讨到：“我们能得以翻身，有吃有穿，安居乐业，都是八路军给我们的，没有八路军来解放我们，慢说吃地瓜干吃不到口，还得被人逼死。八路军来了后，住在哪庄，不要小工，还给我们挑水扫街，自古以来我们没听见谁说有这样的队伍，这才是真正老百姓的队伍”。⑧ 民众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后，往往表现出悔恨和懊恼的神情。有的民众凄凉难过，唉声叹气地说：“今天我才真正知道八路军是自己的队伍”。⑨ 正是由于很多民众心怀愧疚，他们在检讨时，表示以后不会再犯错误。如莒南县一个村干部检讨说：以前，“我瞧不起八路军，所以就不好好工作，以后要改”。⑩ 可见，中共通过积极调动民众的情绪，使其正统观念在逐渐削弱的同时，拥军观念也得以加强。

第二，推动了群众劳军优抗运动的发展。民众在检讨的过程中，将过去各种拥军和优抗不够的现象如交公粮掺沙、使水，烙厚煎饼，缝衣服一针当两针，偷留东西，住房子不叫住，瞧不起抗属，侮辱打骂抗属等都检讨出来。而民众为了弥补自身的过错，自觉地提到劳军，各地村庄的民众先后制定了各种拥军公

①《招北县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②《招远县1、2、3月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7。

③《牟平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2-008。

④《胶东各救会开展拥军参军工作的指示》(1946年1月3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24-01-0627-004。

⑤《平度县政府1至4月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4月25日)，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4-002。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52页。

⑦《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年5月)，第20页。

⑧《昌南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524-006。

⑨《招远县1、2、3月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7。

⑩《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约。如开荒模范郑信决定多交公粮三十斤，给两家抗属固定代耕，动员一个青年参军。公约是参与制定的单位和个人共同信守的行为规范，它对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安定团结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拥军公约的影响下，上下各组织各阶级都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农民负责代耕，民兵、青年、小学生和儿童负责挑水拾柴，妇女帮助烙煎饼、缝衣衫，干部经常征求意见解决困难，上层租地借粮。这就改变了过去优抗劳军大部分靠政府的局面。仅胶东东海区的43名儿童在1945年的上半年中，向八路军捐赠“毛巾9条，裤子7条，扇子125把，洗衣117件，杏子70斤，万金油15盒，草帽12个，芋头10斤，韭菜8斤”，给抗属“抬水25765担，拾泥3060篓，拾草11153斤，割麦子12.5亩，挖菜110篓，送粪7驼，送地瓜干130斤，送杂粮130斤，锄地12亩，种菜3000棵，种豆3亩，刨地4.5亩，栽地瓜1.5亩”。① 而民众的劳军优抗活动，无疑对减轻政府财政压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改善和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民关系在军队的内外关系中处于异常重要的地位，军民团结一致对捍卫国家安全和保持社会稳定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② 然而，军民之间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咀牾之处，部分村干部甚至存在“患难时间盼八路军”，安定时“嫌弃八路军驻扎麻烦”的不良心态。而民众在进行良心检讨后，这种情形则发生了巨大转变。莒南县的一个村庄“工作原来不算好”，在进行良心检讨后，1944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六团五连移驻到那里，村民事先得讯，非常高兴，村干马上开会讨论，让出房子，打好地铺，大部是让出堂屋而群众自己住灶屋。队伍一到，村干吹哨子集合，民兵、农救会、妇救会和儿童团马上列队到庄外欢迎，不断鼓掌，队伍停下休息时，村长和农救会长立即走到跟前慰问，接洽住宿和办给养等问题，其他群众，不分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拉拢队伍往自己家里住，拉不到的就不高兴。队伍住下后，妇救会员马上就烧水送到班上给战士洗脚，向他们要衣衫洗，青年儿童则打扫街道，民兵自卫团则布置岗哨，不叫队伍自己动手。六连士兵很高兴，次日集合，给全庄老百姓每家担满一缸水，表示爱民。晚上群众准备联欢会，队伍有任务要走开，老百姓感到很扫兴，百般挽留，战士也有点恋恋不舍。③ 可见，良心检讨运动的开展确实推动了军民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军民一家亲”。

第四，推动了参军运动的顺利开展。前苏联伦理学家季塔连柯曾谈到：“良心是人的心理中理性认识和感性感受的特殊融合物。”④ 在当时，中共领导的群众性的良心检讨是教育群众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会联系到各方面，如正统观念、个人对八路军认识上的思想转变、个人自私自利等问题，这比上课还现实得多。⑤在召开良心检讨会时，许多民众为了展现出自己的转变，当场表示会积极动员自家亲人参军。如招远县东沟村长刘春宝在良心检讨后提出，“我一定要动员我的儿子参加八路军，我大儿不去，我要动员我二儿，保证去一个”。⑥ 而在参军报名之时，良心成为动员民众参军的“有利武器”，部分民众甚至认为不去参军就是没有良心的体现。牟平县三区鲍泉泊的民兵要求一个干部领头参军，而这个干部不愿意，其他干部便说：“你真忘本，没良心，不是减租减息你能捞着好地种吗?”在听闻此话之后，这个干部幡然醒悟，说：“不错，我一定要去参军!”而他的参军也成功带动了一大批青年去参军。⑦

综上所述，中共所领导的群众性的良心检讨是一种从实际出发，教育群众、动员群众并打通群众思想的良好方式，是自我批评在群众中的具体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是中共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中共为了能够对广大乡村社会实施有力控制，便灵活的将自我批评的方式引入到民众动员中来，希图广大民众能够成为活跃于国家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在

---

①《干部、青救会员拥军参军、生产等情况统计表》(1945年7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3-01-0017-001。

②《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人民日报》1967年5月12日，第1版。

③《滨海区莒南县委关于拥军参军工作具体总结》(1944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01-01-0101-003。

④张慧青：《浅析道德良心的本质与作用》，《青年与社会》2013年第4期。

⑤《广饶县拥参工作具体总结》(1945年5月)，第26页。

⑥《招远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3-006。

⑦《牟平县政府拥参军工作总结》(1945年4月)，山东省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G031-01-0252-008。

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来看，中共领导的群众性的良心检讨运动是非常成功的，普通民众得以更为拥护中共和其领导的八路军，致使在抗战进入反攻阶段后，山东八路军的兵员得到大量扩充。至1944年底，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由1943年初的9万人发展到15万人以上，占根据地基本区800万人口的1.9%。1945年8月，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23万人。八路军兵员的补充一方面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人力基础，另一方面则彰显出中共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而正是由于中共始终强调充分的了解、启发和教育民众，从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拥护，中共最终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Moral Education and Pubilc Mobilization: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Research on Conscience Review Movement (1943-1945)

GENG Dong-xu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01,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entered the stage of counter-offens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rgently needed to expand its military power in order to w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050001, the first is to hope that the people can actively join the army, but the people because of many concerns, which undoubtedly increase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Shandong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government launched a mass conscience review campaign. Through intentional guid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strengthened the concept of people supporting the army in the Shandong region, further developed the popular labor movement, and closer military-civilian relations,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thus emerged the situation of people actively joining the army, to ensure that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when the counter-offensive has a relatively strong reserve force of soldiers, thus laying a human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conscience review movement; mass mobilization

[责任编辑　山阳]